

内容提要

本书是由英国韦斯特敏斯特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巴里·布赞和布里斯托尔大学讲师埃里克·海凌合写的一部战略、安全与国际关系论著，作者从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与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入手，探讨了技术的频繁改变对于世界军事与政治的巨大影响，对于不同国家在技术强制条件下的军备获得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做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了冷战时期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原因及其危害。为了描述世界政治中的军备过程，作者提出了一个“军备动力”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下涵盖了从军事现状保持到军备竞赛等一系列的军备获得状况，军备动力与世界政治是什么关系，在国际政治体系下，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军备动力，以国家为单位的行为体通过何种方式运用军备动力，如何控制军备动力以避免现实的军备过程走向战争，成为本书的主题。

作者抛弃了以往战略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冷战思维，对于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做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尽管军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维护国际安全的作用，但是，在根本上，军备手段本身就是造成国际体系不安全的根源。所以，由军事手段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本身得到解决。如何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作者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思考，如军备控制、非攻势防御、裁军等等。对于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以及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作者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部分对军备动力进行了考察，指出军备动力是促使国家获得武装力量，并改变他们在拥有武装力量的数量与质量时所承受的压力状况。这主要围绕两个主题：（1）军事技术革命；（2）这些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业已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其中，特别关注军备贸易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此外，这里还分析了民用与军用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军事安全的意义。

第二部分着重解释了什么是军备动力及其所包括的层次。本书作者将国家间的军备竞赛按激烈程度分为四个层次：逐次减弱、保持、竞争（即逐次增强）及军备竞赛。所有这些都是同一总体军备动力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一部分，作者还使用行动—反应模型和国内结构模型这两种模型解释来寻找促使军备动力发展的因素。

第三部分介绍了军事能力的三种基本作用：武力、威胁和象征。武力经常是发生矛盾时最后诉诸的手段，但武力绝非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此外，威胁和象征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对战争代价的恐惧和国家的相互依赖性等因素，共同造成了战后相对较长时间的和平期。文章还介绍了威胁和象征的微妙作用及其运用情况，并强调了媒体和宣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论述了军备竞赛和过度的军备增长对世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并介绍了军备控制、非攻势防御和裁军领域的理论发展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本书内容丰富，逻辑严谨，观点深刻，出版以后，便引起了西方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领域的关注，被誉为“对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的最有意义的贡献”。这部著作即是国际政治研究人员必备的文献，也是一部高质量的国际政治教学参考书。

总 译 序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世界军事的发展极为令人瞩目。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导致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世界大战虽然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爆发，但局部战争却连绵不断。美伊矛盾引发了海湾战争，南斯拉夫问题引发了科索沃冲突。目前，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而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也未得到彻底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甚至面临着意外的核武器的威胁。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令人忧心重重。鉴于此状，我国国际政治与军事研究领域内的仁人志士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以求在安全环境和战略指导上寻找突破口。国外的情况也不例外。《世界军事译丛》原书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向世人奉献出了他们独特而又新颖的观点和认识。译丛本身则旨在介绍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等重大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从而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一幅世界军事的整体框架与宏伟画面。译丛所选内容既揭示了战争历史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而译丛书籍的选择既注重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又兼顾读者需求的客观趋向，因此可以说该译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可读性。

但是，译丛的规划与组织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要从众多的书目中选出非常合适及完全理想的书籍并非一件易事。此

外，翻译本身又是一件要求很高但又乏味的工作，要组织优秀的翻译力量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令人欣慰的是，我军各单位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军事科学研究人员和军事学术翻译人员，他们的学识令人钦佩，他们的外语水平令人刮目相看。参加本译丛翻译的人员大都工作在我军最高研究机构和我军最高学府，具有军事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并在多年的军事科学研究实践中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他们加入此项工作的翻译将使本译丛蓬筚增辉。我们相信，译丛的出版对于从事国际政治及外国军事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大有裨益，对于关注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的人士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广大的军事爱好者更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把译丛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这在今天虽不是一种时尚，但却是一种难得的可贵，这是本译丛得以成功翻译出版的关键所在。

译丛主编

2001年7月于北京西山

为了永远的和平——译序

人类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战争，这几乎是历史学和政治学无法考证的问题，对于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战争，人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或许有些人说的是对的，战争的根源是人类关系的竞争本质。在历史上，对于每一个社会来说，战争是如此的重要，它关系到每一个社会的生死存亡，以至于每个民族的命运都系于战争的胜败一线。于是，战争的方方面面都引起了每个时代的人们的关注，也就有了历史上以出奇制胜为目的的兵法研究，也有了当代世界风行一时的以致胜为根本追求的战略研究，同样，也有了以避免战争为目的的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的《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一书，是英国韦斯特闵斯特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巴里·布赞和布里斯托尔大学讲师埃里克·海凌合作的产品。“军备动力”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所指的是由于人类社会持续的技术进步与技术传播产生的推动军备生产、装备、扩散以及国家间军备竞争或竞赛的机制，这种机制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全部的军备过程。按照作者的说法，军备动力虽然没有直接地决定着世界政治，但是，它却通过某种戏剧化的方式构成了世界政治的背景并且影响着世界政治中的各种可能性。这是一本涉及和平研究、安全研究与战略研究三个领域的知识的国际政治论著，其基本精神是探讨军备动力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冷战以后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对于军备动力产生的影响。在以往，我国国际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或军事战略方

面的研究，把军备动力和军备过程作为切近国际政治研究的门径，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技术进步的历史，持续的技术改变使人类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渐次进入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技术的进步在改变着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在戏剧性地改变着人类全部的社会关系。19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技术频繁改变的革命过程，技术革命的显著后果之一就是工业化过程在整个世界的传播，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时下，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其内在的动力仍然来自于技术革命。就像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人们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确实地说，我们也不完全知道未来的生活究竟会是怎样。

在技术革命推动着社会历史进步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至为明显的就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应用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与扩散。近现代以来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成果中，几乎没有哪一种技术不具有双重用途，近代的化学知识一方面使人类拥有了近代医药工业和化肥工业，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拥有了炸药，近现代的电子、通讯以及机械制造技术，使飞机、轮船、火车、电信电报成为可能，但所有这些也正是希特勒实行闪电战术的先决条件。

当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使人们告别了冷兵器时代以后，整个

世界便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最初的火绳枪发展到后膛装填的步枪和火炮，尔后，随着生物、化学以及核能知识被用于军事领域，又出现了像原子弹、生物毒素武器和化学武器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对于少数几个军事大国来说，要摧毁一个甚至是地球上所有的数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经不再是难事。近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结果，不啻于人类把屠刀架在了自己的头上。这恰恰是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悲哀。

频繁的技术改变对于每一个社会的军备过程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制，事实证明，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只要在军事技术领域里实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也就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优势。当年西班牙人比萨罗凭164个人、两门大炮征服了印加帝国，便初步印证了先进技术无与伦比的优势。到了20世纪下半叶，现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的结合，使得拥有这些技术的国家可以用不很多的钢铁和少量的伤亡就可以打败一个国家。1990—1991年美国领导的联盟仅以250人死亡的代价就把伊拉克人从科威特赶了出去，这在以往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使战争变得很“经济”。事实告诉人们，在现代战争中，技术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先进技术却是万万不行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技术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有着无限的诱惑力，我们很难知道，那些致力于发展技术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技术上占领先地位的国家，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还是把技术优先用于战争。

军事领域里的技术革命引起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军事理念与战略观念的改变。由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大规模杀伤武器与远程运载系统的结合，对于参与一场战争的国家来说，已经没有了前方与后方的概念，以往人们所说的“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也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那么，军事技术革命究竟是由什么原因推动的？对于这一问题，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工业化国家对于人的重视，也就是说，由于对于人的伤亡的敏感性而导致了现代军事技术研究的大量投入。在某种意义上，作者的这一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现代军事技术的应用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员伤亡，可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武器却大多是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如果说在我们的观念中人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的把我们的智力用于研发这样的武器？为什么会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中子弹的出现，据说这种炸弹能够有效地摧毁一定范围内的生命而不破坏建筑物。由此看来，有关技术的伦理问题并不像我们的直觉那样简单。

技术革命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日益显著。对于国际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来说，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可是先进的军事技术的获得却使整个世界变得更不安全。不仅如此，就是科学技术也因为其可能的军事用途而陷入了这种两难状态，为了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有更高的质量，我们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可是，先进的技术成果却有可能被用来破坏我们的社会生活，会变成危及很多人的生存权利的工具。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不仅要问，这究竟是谁的过错？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技术本身不是屠刀，它也不会发动战争，问题是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样的人掌握了这些技术。就我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言，当代世界的安全困境是无法用技术手段解决的。

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是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

划，这一计划的前身大约是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布什政府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一计划受到了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在表面上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纯粹的防御手段，国际社会似乎也不应对此大惊小怪。可是，巴里·布赞和埃里克·海凌却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那就是在军事领域里本来不存在进攻与防御的严格界线，战争本身就是矛与盾的结合，假如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进攻能力，同时它又拥有坚固无比的防御体系，这对整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防御能力拥有绝对的信心的话，它也就很可能会肆无忌惮地进攻他人。更何况美国从来没有保证它不在别国的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表明，美国政府仍然试图用技术手段解决安全困境，其结果只能是在安全困境中越陷越深。

二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过程是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与此相应，也存在着一个军备扩散的过程。历史地看，对军备扩散过程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的是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欧洲近代殖民者的殖民过程，那些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触角伸到了哪里，工业化的军事产品带到了哪里。另一个因素就是二战以后东西方的冷战对抗，超级大国通过军售、军事援助等名目众多的方式，使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流向低度工业化国家。对于军事技术的全球传播的具体过程，本书作者做了十分清楚的描述，我们这里无庸赘述。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军备扩散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促使那些技术领先国家大量地出口工业化的

军事产品，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应该如何评价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军备扩散过程。

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世界上相当一些根本不具备现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在他们的人民还没有分享到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情况下，却有了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按照常识的理解，特别是对于那些低度工业化国家来说，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其国家的安全程度也就会相应的提高，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海湾战争以前，曾经有大量的高技术含量的军事装备流入海湾国家，可是，像科威特这样的国家仍然无法抵挡来自伊拉克的侵略。事实上，像这样虽然拥有高技术的军事装备但其国家并不安全的国家，绝不只科威特一个。那么，军备扩散的结果对于低度工业化国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断定，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安全程度的提高，恰恰相反，却是使伊拉克那样有着较强的扩张欲望的国家进一步坚定了入侵它国的信心。在总体上说，低度工业化国家，特别是那些弱小国家并没有从全球性的军备扩散过程中受益，是一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1977年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报告》中曾经指出，用于现代武器的开支与急迫的贫困人口的福利需求以及低度工业化经济的投资需求是矛盾的，对于那些贫穷国家来说，为了保持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他们必须把大量的资本和熟练的劳动人口投入到军事领域，而这恰恰是低度工业化国家最短缺的资源，为了购买现代的武器装备，他们不得不用自己国家的自然资源来换取硬通货，虽然武器在随着技术革新的速率不断地更新换代，可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却在艰苦奋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在西方国家流行着一种被称为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按

照这一理论，国家把一部分公共资金用于军事工业，就可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照此说来，工业化国家对于军事工业的投入在经济上应该是有益的，可是其实际结果怎样，却只有那些技术领先国家自己心知肚明。二战以来，西方国家一直用信用担保的方式刺激军火公司的武器出口，如本书作者揭露的那样，1985—1994年间，英国的军事出口只占全部出口的1.7%，但是却获得了33%的出口信用担保。可是，在1990年以后，由于相当一些购买英国武器的国家拒绝承担付款义务，英国的出口信用担保局每年付给军火公司赔偿金竟达40亿美元，在这期间，仅仅因为伊拉克拒绝向英国的军火公司付款，英国政府就赔上了15亿美元，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不是工业国家发展经济的利器，却成了伤害纳税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的祸首。

“理解军备贸易的关键在于有一个支持它的强大的利益集团”，也就是来自于军备生产国内部的制造商的压力，实际上，在近代以来的军备扩散过程中，只有这个集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有一个名叫巴兹尔·扎哈罗夫军备销售商，创立了一种臭名昭著的“死亡商人”模型，即同时把武器卖给敌对国家双方，如，把潜艇同时卖给希腊和奥斯曼帝国，把战列舰卖给敌对中的阿根廷、智利和巴西。西方国家对于这种贸易方式可谓乐此不疲，两伊战争期间，把同样的武器卖给伊朗和伊拉克。在这种死亡贸易中，利益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的无疑是那些军火制造商和军火出口商。

除去来自军火制造商的压力以外，工业化国家着意武器出口也有其内在的政治动机。冷战期间，军援、军售一直是超级大国扩大势力范围，争取政治上的盟友和间接削弱对手的一种手段。冷战期间，美国也曾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

则是为了满足其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需要，此外，几乎所有的反共产主义国家都曾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那里获得过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当然，一些反西方国也相应地得到了前苏联的军事援助。超级大国欲图称霸世界的政治动机，是隐藏在军备扩散过程背后的真实的动力。

1990—1991年间，美国领导的盟军曾经成功地把伊拉克人从科威特赶了出去，就这场战争本身而言，其正义性是不容怀疑的，可需要反省的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萨达姆本人的意志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同样应该注意到伊拉克在此之前有一个十分充分的现代化军备获得过程，而伊拉克最大的军火供应者就是美国，为了抵消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的影响，美国向伊拉克出售了大量的军火，可是，这一结果最终却伤害了科威特。如果没有战前的军备获得过程，萨达姆会不会有足够的入侵科威特的信心将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事隔10年以后，如果人们要问，海湾战争发生的终极根源是什么，引起美国及其盟国250名士兵死亡，并且使为数众多的美军士兵罹患海湾综合症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美国的那些政治家们心里应该最清楚。

巴里·布赞和埃里克·海凌的这本书是在1998年出版的，当时他们曾经断言，印度与巴基斯坦是两个潜在的核国家，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而且这两个国家都不肯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他们不肯承担禁止核扩散这一对于整个世界的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的道德义务。另外，在这本书里，他们也列举了一些具有潜在的核能力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什么时候会公开拥有核武器还是一个未知数。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制造技术的扩散，是当今

国际安全所面对的主要危险，很明显，扣在核武器的扳机上的手指越多，其被击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人们无法保证，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某个国家的领导权不会被那些战争狂人窃踞。总之，近代以来全球性的军事技术传播过程，使整个世界也正在使整个世界深受其害。

三

与传统的战略研究不同，近年来出现的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基本精神不是如何通过战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如何实现安全和避免战争。在国际政治中，战争与使用武力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而如何在国际国内事务中避免使用武力，则是当代世界所有人共同关心的主题。

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国家之间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人们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中为什么要诉诸武力，人们很难为这一问题找到绝对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战争本来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不过，我在这里试图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做一些说明。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军事是政治的一种工具，”这一观点曾经风靡整个世界，无论是以往，还是当今，几乎所有试图诉诸武力的人们大都是把战争作为政治的工具来看待的。可以说，这种工具主义的态度是深藏于人们的主观心理层次上的战争根源。也正是这种观念，使本来不应该发生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和战争具有了价值的合法性。

把战争看作是政治的工具，也体现了以往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即在大多数的人们那里，都在观念形态上把暴力理解为政治的本质。以暴力的手段来适应暴力的政治，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事务中的政治问题，当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

式，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使用武力的结果只能是使整个世界更加充满暴力。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把战争或使用武力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割离开来，但是可以断定，战争和使用武力一定不符合人类普遍的类本质，如果我们承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每个人、每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都拥有平等的权利，都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的话，那么，为什么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还要使用武力，诉诸于武力的政治一定是不好或者不怎么好的政治。

当今世界上，避免战争所以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这是因为每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一切违反人道、残忍的事情便有很高的发生概率。在《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这本书中，作者曾经深入讨论了与生物毒素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并且列举了一些两次大战中使用这些武器的实例，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没有提及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各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北研究和使用的生物毒素武器，并且以之伤害平民的问题。可以言之凿凿地说，这场疫情是由日本军队在东北的生物毒素研究和故意传播引起的。感谢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使我们有机会把日本侵略者当年犯下的戕害人类的罪行说给更多的人知道。

战争和使用武力是军事领域里的现象，但是，战争的根源却不在于战争本身，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不能否认，自二战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在避免战争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威慑、限制战略核力量、限制常规武器数量、部分裁军、实行非攻势防御政策等等，可是，在这些努力的同时，大大小小的战争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原因何在？很可能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走进了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即试图用军事的方法解决军事领域里的问题。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种事物

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也没有任何一种事物的原因就是它的本身。当人们试图用军事方法解决战争问题的时候，在事实上都接受了战争所以存在的绝对前提，无论是威慑，还是非攻势防御政策，在本质上都是对于战争的某种承诺，假如我们有了战争的承诺，要想在根本上避免战争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冷战以后，裁军以致于全面彻底裁军成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热门话题，东西方国家在销毁战略核军备、削减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丝世界和平的曙光。但与此同时，发生在科索沃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争与暴力又为和平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确实地说，单纯从军事方面入手，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军队，即使是销毁了战略核军备和大规模杀伤武器，军备制造技术和这方面的知识却依然存在。即使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真的出现了一个裁军后的世界，如果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充分的对于人的尊重，没有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将无法排除有人重拾战争这一“政治的工具”的可能性。

总之，在和平的道路上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

2001年8月

前言

本书是《战略研究入门：军事技术与国际关系》（以下简称ISS）（巴里·布赞1987年著，由麦克米伦公司为战略研究国际研究院出版）一书的续篇。ISS写于冷战时期。它反映了当时战略研究的重点在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尤其是核威慑的核心地位。它同时也试图在军事技术对各国关系的影响方面做出战略研究上一致的解释。然而，到了90年代初，与其他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书一样，ISS已经严重过时了。

与他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一直运用的分部方法相一致，布赞认为通过军事透镜观察世界政治这一基本方法值得保留。1993年，他与埃里克·海凌联系，提出了与之合作重写ISS的想法。一旦我们决定放弃将新书作为一本战略研究入门书的想法，我们发现我们之间有足够的共识以制定计划。我们一致认为这本书将不仅针对战略研究，还将针对和平研究的学者与学生，它将反映过去的十年中这两个领域差别的缩小。同时它还要关注危机性安全研究这一新兴领域。我们的策略是：在重新调整论题使之适应冷战后战略环境的同时继续探讨ISS的副标题的内容。将对核武器的注视扩大为总体上对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关注，并赋予了其他军事力量层次更广泛的空间。

我们确定重写的总体原则之后，海凌进行了第一次节选，从ISS的正文中选取了所有有用的材料，并写出了一个完整的

初稿。之后布赞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论并写入其他内容；各章的内容经反复推敲直到令我们满意为止。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之间没有大的分歧，只有几个次要问题需要回避，因为确实有分歧或者潜藏着分歧。

在工作进展的过程中，我们决定在对正文进行改动时不注明改动的内容。虽然这样做意味着我们每次检查新稿时必须完全重新阅读，但是我们想让我们的手稿成为完全意义的合写稿，而不是这一点是一个人的，那一点却是另一个人的。这样的写作过程有时会导致有趣的结果：有时一个人正对某段议论大表不满，另一个人却很得意地给他发电子邮件说：“这些东西不是我写的——是你写的！”

我们一致认为军事技术的主题需要进一步拓展，虽然它的基本范畴大体没变。它不仅应该反映出军用与民用技术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还必须反映出主题中重点已经根本改变，并给军事安全议程下定义。这一转变意味着，松动ISS中相当顽固的新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并正视这一事实：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国内舞台已成为主要的军事论坛；而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国际舞台已发展成为成熟的安全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敌对的军事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变化反映在第三部分中，该部分已由对核威慑的冷战讨论发展成为对使用武力、威胁与象征的更加广泛的评估。

我们还一致认为虽然我们应继续关注军事安全这一狭隘逻辑，但需要加强这一观点与更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与规范环境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已经是ISS的一个特征，但即便如此，一些读者还是认为该书实际上是技术决定论的作品（雷比，1990）。这次我们决定要防止这种误解的产生，我们强调了选择、政治及价值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我们不仅